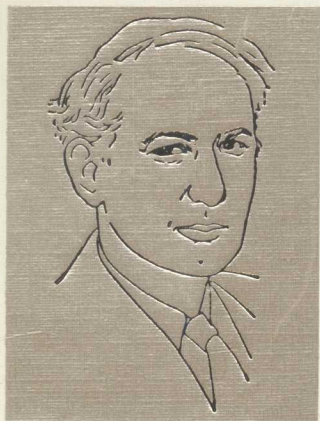




Harold Innis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
展江 何道宽 主编

帝国与传播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中文修订版·英文（双语版）

[加]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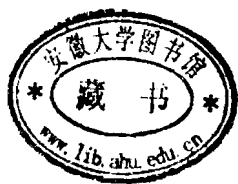
师系列

帝国与传播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中文修订版·英文(双语版)

[加]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与传播/(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2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

ISBN 978-7-5657-0623-3

I. ①帝… II. ①伊… ②何…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000 号

帝国与传播

著 者 [加]哈罗德·伊尼斯

译 者 何道宽

策划编辑 司马兰 姜颖旻

责任编辑 姜颖旻 张 璞

封面设计 运平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623-3/G·0623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

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润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还另附英文全文，以便读者查阅。“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展江

2012年11月20日

目 录

修订版译者序	1
译者序	9
麦克卢汉序言	19
作者前言	31
第一章 绪 论	33
第二章 埃 及	44
第三章 巴比伦王国	57
第四章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83
第五章 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	112
第六章 羊皮纸与纸张	147
第七章 纸张与印刷机	17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217
Preface	219

I	A. Introduction	221
	B. Egypt	232
II	Babylonia	247
III	The Oral Tradition and Greek Civilization	276
IV	The Written Tradition and the Roman Empire	308
V	Parchment and Paper	341
VI	Paper and the Printing Press	370
	Transcriber's Notes and Errata	409
	译后记	411
	修订版译后记	413
	译者介绍	415

修订版译者序

10年前，在《帝国与传播》的第一版译者序里，我分三部分介绍了伊尼斯及其与麦克卢汉相得益彰的学术志趣，这三部分分别是：（1）何为帝国？何为传播？（2）伊尼斯的理论贡献。（3）多伦多的双星。

10年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出《帝国与传播》的汉英双语版，使我有机会获得新的发现和心得，特在这篇小序里向读者汇报。现在分四部分做一个小结。

一、媒介环境学派问鼎传播学主流

和绝大多数的国内外学者一样，我对多伦多传播学派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0年前我倾向于同意绝大多数论者的判断，将这个学派称为“技术决定论”，同时又隐约感到委屈了这个学派，并为其鸣不平。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里写道：“我要为‘媒介决定论’鸣不平。迄今为止，学界对‘媒介决定论’多有诟病。其实，在我看来，它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第一生产力’主要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问题，而‘媒介决定论’切入的角度，是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已。”

我对伊尼斯、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以2006年

为界。此前，我将其称为传播学的“技术学派”；此后，我根据北美 Media Ecology 学会的最新成就，将其称为“媒介环境学派”。

为系统研究这个学派，我译介了林文刚教授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维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译介了莱文森的《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发表和宣讲了五篇论文：《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二》（《国际新闻界》，2007 年第 1 期）、《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前沿课题研讨会，2007 年 5 月）、《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2007 年 8 月，南昌）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 年第 1 期）。

2011 年以后，以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为契机，我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出版新的译作，深入研究伊尼斯、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主要成果有：《下一个世纪的朋友：再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北京《科学时报》，2011-7-28 B3）、《面向未来的麦克卢汉》（上海《社会科学报》，2011-8-4 第 6 版）、《为什么要纪念麦克卢汉？》（深圳《晶报》，2011-7-14 B09 版）、《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在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的译者序里，我对三大传播学派做了一些比较，肯定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独特视角，高度评价了伊尼斯的独特贡献，兹摘引三段，以明其要：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以施拉姆和四位先驱为代表。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走向成熟，以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代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哈罗德·伊尼斯以两部篇幅不大的巨著《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阐述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偏向论’，同时批判英帝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极度扩张，警惕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负面影响，唤醒政府和民众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他的背景是经济学，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

“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派。”

二、伊尼斯的霸气与豪气

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霸气和豪气兼而有之。其霸气从书名一望而知，书中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其豪气却比较隐蔽，需要一点笔墨揭示。

他的霸气建立在 30 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 20 年里，他完成极具原创性的 4 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两部世界级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御繁，所以他提出了“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 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为什么伊尼斯试图拯救西方文明呢？这和他的生涯与治学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送往欧洲去给英帝国当炮灰，洞悉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他认为西方帝国狂热追求开疆拓土，具有强烈的空间扩张偏

向，反而忽视了文明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积累。

新千年前后，他的思想遗产进一步得到弘扬。1994年，在伊尼斯百年诞辰之际，加拿大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加拿大学界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会的主要成果陆续问世，笔者已经见到有三本书，一本特刊。它们是：《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伊尼斯在新世纪》、《伊尼斯画像》、《加拿大传播学季刊·伊尼斯纪念特刊》。这些书刊全面介绍并继承了他丰富的思想遗产。

三、伊尼斯研究的新成就

1994年伊尼斯百年诞辰以后，伊尼斯研究进入新阶段，他的三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继续出版，纪念他的专辑和两部传记也先后问世。已故传播学名家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写了一篇超长的序言（1万余字），高度概括并肯定伊尼斯的杰出贡献。我们在这里概要介绍凯利对伊尼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 viii，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

（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时，他仿佛在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

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同上，p. xii）

（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最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的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同上，pp. xii—xiii）

四、“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伊尼斯关于“帝国”的思想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帝国与传播》（简称《帝国》）和《传播的偏向》（简称《偏向》）是第一阶段，稍后的《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第二阶段。

在前期的《帝国》与《偏向》中，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分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至于他所谓“帝国”的性质，凯利的判断是：“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详细引文见上）

不过我认为，凯利的判断并不严谨，似有疏漏，仔细研读《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就可以发现，伊尼斯用大量的篇幅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为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并为其提供了自救的良方。

新千年以来，美国的战略走向令人不安。

和历史上一切走向衰落的帝国一样，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一方面，其“世界警察”、“全球领袖”、“一超独霸”的野心有增无减，且军事主义的倾向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其经济实力不断衰退，且“光辉”形象屡遭自毁，它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

伊尼斯确有超前的眼光。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里，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批判，连为其作序的凯利也忽视了。

为了补救凯利的疏忽，我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译者序里用了一大段文字，集纳该书的批判思想，借以展示伊尼斯深厚的历史睿智和洞见：

浏览《时间观念》的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 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

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做了很好的归纳：伊尼斯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会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凯利序》，p. xviii，下同）

他又说，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伊尼斯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凯利序，p. xviii）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 39）

2. 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一百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

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 34 任总统中，军人出身的就有 10 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 频繁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 年，第 11 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

经纬线 50—45 度，否则开战。(p. 59)

1898 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叫嚣：

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
(同上书，p. 30)

华盛顿及其 19 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 1823 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
(同上书，pp. 21—22)

4. 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同上书，p. 117)

5. 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

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

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同上书，p. 59）

6. 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加拿大，我们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同上书，p. 59）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同上书，pp. 11—12）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9月6日

译者序

一、何谓帝国？何谓传播？

《帝国与传播》问世已经 50 余年，20 来万字，却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作者伊尼斯（1894—1952）去世已经整整 50 年，但是一直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因为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与他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派，成为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也备受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 21 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这给麦克卢汉留下很深的印象。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临终之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 1,000 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张、报纸和舆论的影响所做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

他为后世留下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欲了解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数万里的历史，这两本书构成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

在两篇序言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他肯定伊

尼斯的历史地位，推崇其研究路子，指出其研究特征：构建“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field-theory）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以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6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以明白，他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他这一次的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可喜可贺。